试论近代中国科学主义的生成与演化

李　侠,　刑润川,　赵　冬
(山西大学 科技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演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生成期、建制期和渐趋成熟期。相应地, 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则是器物形式、制度形式、价值观念形式。科学主义在完成它的三种形式的变迁过程中, 暗含了传统文化变迁的思想准备, 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上的变迁, 科学主义在中国就无法取得存在的合法。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生成期应是 19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建制期为 19 世纪的 90 年代, 至 20 世纪 20 年代达到它的渐趋成熟期。

[关键词]科学主义; 生成; 演进; 路径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2-0038-08

综观中国近代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生成与演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条始终没有中断的历史主线: 科学在中国从萌芽状态到逐渐建制化与发展壮大的历程。在当今的中国, 科学已经取得了国人的充分认同, 随之而起的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日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导致最近学界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也趋于激烈, 无论支持科学主义也好, 还是反对科学主义也罢, 在做出最终的定论之前, 首要的任务就是对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的生成与演化的变迁路径进行一些仔细的梳理, 才能使这场争论不至于流于表面化与简单化之中。我们通过对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 认为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演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生成期(1860～1895)、建制期(1895～1915)和渐趋成熟期(1919～1923), 相应地科学主义呈现的文化形态分别为: 器物形式、制度形式、价值观念形式。只有对这个演化阶段进行细致的清理, 才能真正找到当下中国关于科学主义争论的焦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国生成的被动性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 科学主义不是我们的特产, 完全是舶来品, 而且这种输入不是主动完成的, 而是为了应付巨大的民族危机被动接受的, 这就决定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生成的艰难性。这种被动性往往是由于突发的历史事件的深刻影响所致。对于中国的近代史来说, 影响中华民族整体心理意识的事件是鸦片战争(1840 年), 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划分的起点。因为, 正是这次事件给沉睡的中国人以强烈的震撼, 天朝大国的不堪一击, 令国人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是能否把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当成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起点呢?我们认为不能, 因为这次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个局部事件, 还无法完成唤醒所有国人对西方的科学和近代文明的深刻认识。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对于中国来说, 把清朝统治下发生的地方事件——1839～1842 年焚烧鸦片事件(以后此事件被称为鸦片战争, 但当时清朝并未把它看作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当然起点和历史分期标志的时候, 窃以为, 如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标志的话, 那么中国的近代, 则应追溯到 19 世纪初。如着眼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 那么中国的近代, 开端于 19 世纪后半期似乎更为妥当。”[1](p9) 对于滨下武志的观点, 我们并不赞同, 但是他提出以经济或制度的变化作为分期的标准, 倒很有启发意义。鉴于此, 近代史的分期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是合理的, 但是科学主义生成的分期以此为起点是不妥的。因为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 当时绝大多数的国人并没有完全切身地感受到科学及其威力, 只是部分地区的部分人感受到了近代科学的威力。因此, 我们认为只有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 年)以后,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 国人才开始

[收稿日期] 2002-12-15
[作者简介] 李　侠(1967-　), 男, 辽宁辽阳人, 山西大学博士生; 刑润川(1940-　), 男, 河北邯郸人, 山西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赵　冬(1961-　), 男, 山西榆次人, 山西大学博士生。

逐渐接受科学的器物层次，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主义在中国才找到了生存的理由。

当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一再打败自认为是天朝大国的时候，当时的有识之士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古老的文明真的比不上形而下的器——坚船利炮。作为当时的开明知识分子和官僚，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由 60 卷又扩充为 100 卷，“书中除了详细介绍西洋的船炮、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军事装备外，还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宗教、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2](p73) 在《海国图志·序》中，魏源说：“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版形式。正是这简单的 7 个字，包含了中国近百年被动学习西方的痛苦历程，也正是在师夷的过程中，科学主义以粗糙的形式在中国逐渐站稳了脚跟，由此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开始以独特的面目走上中国思想的舞台。

(一) 中体西用与科学主义的器物层次的发展。

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的 7 个字，拉开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序幕，那么这个过程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顺利，这个过程充满了保守与革新、拥护与反对等尖锐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生根与洋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在开启民智与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方面，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从广义的角度上说，科学也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也同样是有结构的。按照目前学界的共识，文化的结构通常包含四个层面：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规范层次、价值观念层次(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广义的价值观念应包括规范层次，为了论证的简捷，我们这里采用三分法，即后两项合并)，因而对科学的吸纳与接收的结构也遵循这个结构要求。这个结构反映了人类认识事物的自发秩序，同时也说明了认识由表及里的阻力逐渐加大。换言之，越往文化的深层结构挺进，变迁的难度也越大。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与近现代西方科学文化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因而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就面临着如何减少阻力，以及使科学文化本土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使一种异质文化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取得合法化的问题。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科学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取得广泛的认同与共识，围绕这个问题，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应当说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当时中体西用的目标就是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制夷的最终目的。这个说法最初体现在道光进士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中(《校邠庐抗议》1861 年)。之后得到了洋务派大员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后来的张之洞等人的大力支持，以及洋务派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大力推广。但是，我们应看到，这是洋务派为了减少阻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因为，当时推行洋务的阻力非常大，如果要把这种运动上升到国家的制度安排，必须把阻力和成本降到最低，否则的话根本就无法实施。正如学者雷颐指出的那样：“尽管师夷长技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实践这一主张。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为了对抗顽固派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挑战，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像一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3](p237) 从历史的角度上说，直到甲午战争(1894 年)为止，这个理论模式的主旨是为了反抗顽固派的阻挠与扼杀，为引进西学进行辩护，并为西学寻找合法性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有贡献的，因为正是这个时期，科技的器物层次从上到下得以比较顺利的推广，为中国近代科学的生长提供了一个狭窄的空间，也为科学主义从较低的层次逐渐上升到高层次提供了扩展和回旋的余地。但从大时段的历史空间上看，它是一种渐进的改革策略，缺乏彻底性，甚至丝毫没有认真考虑过科技生长的制度约束问题，对于国人正确认识科学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导致了科学精神培养的先天不足；另外，也容易产生实用主义的科学观，所有这些弊端都在未来的中国得到了体现。为此，我们首先应该把清末的洋务运动的历史与主张从尘封的历史中梳理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何科学主义在中国最初会采取这种低级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比较高级的形式的根源所在了。

清末的洋务运动的起点应该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 1862 年，因为按照国内史学界的共识，“这一年即 1862 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也揭示了在被动的局势下主动引入西学的序幕。不久，上海设立了上海同文馆(亦称广方言馆，1863)，广州也设立了广州同文馆(1864)。1867 年，上海又创立了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专门译印西书。”[4](p113) 译介西学是师夷长技的首要和必须的起点，只有对西学有了深刻的理解与体味，制夷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里的西学在当时的语境下，更多的是一些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突出了它的实用性。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 1872 年开始正式出书，到 1880 年共出 98 种 235 册。”把时间段再放大一

些, 可以看出从“1868 年至 1907 年 40 年间, 翻译馆印西书达 159 种, 1 075卷。 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 30 余种关于文科书籍外, 其他均为适用知识和工程技术类。傅兰雅 1878 年的《译书事略》所录书目最多的就是兵法工艺、造船、天文行船、汽机船、汽机等, 占已刊成书的 40%以上, 占未刊成书的 80%。”[4](p115) 由此可见, 在洋务运动之初, 采西学的主要方向是与坚船利炮有关的实用科学, 由此导致的也只能是科技的器物层次, 远没有接触到科学的精神层面, 这也与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中体西用”有直接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个理论范式存在着先天的不足。 这也说明当一种孤立的成熟的文化在与一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中, 原有文化的保守性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 这主要是由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 顽固派所维系的‘夷夏之防’无法对现实真正发挥制夷的作用, 因而他只能在中体上做文章, 对于形而下的器技, 只能回避, 而洋务派则尽量回避在体的问题上与守旧派纠缠, 直接介绍西方的器技, 这样可以看出两者的争论是各置一端。面对这一千古变局, 最终的结果就是折中的方案: 中体西用。但是,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为何洋务派能够比较坚决地一再克服各种阻力宣传这种理念呢? 难道是单纯的应付时局吗? 显然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 这与 19 世纪初中国学界思想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把这个问题厘清了, 洋务派要求变革的思想内涵才能被真正理解。

(二)“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的奇特结合。

其实, 早在明末清初之际, 传统儒学就已经在发生转化。 正如学者杨国荣指出的那样: “作为儒学的一种形态, 理学注重心性的辩析和义理的探求, 但其末流往往导向了空疏玄虚, 有鉴于此, 明中叶至晚明的一些思想家已开始由形而上的义理之学转向形而下的考据之学。”[5](p50)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由理学回归到经学的传统, 而经学重现了实证的精神。事实上, 从理学到经学的转变, 主要是通过治经方法的转换得以实现的。据学者杨国荣的考证, 清代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面向本文与遍搜博讨; 2. 经验归纳与条理分析; 3. 虚会与实证的相结合; 4. 阙疑与推求的统一; 5. 溯源达流与历史的方法。要而言之, 清代学者的考据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体现了归纳与演绎、逻辑分析与事实验证、无证不信(存疑原则)与大胆推求(创造性思考)的统一, 并贯穿了朴素的历史主义精神。这种方法论系统扬弃了理学的思辨性, 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引向了实证性研究。”[5](p59~69) 这种学风的转变也指涉了人们厌倦了理学的空谈之风, 而求务实的思维路向。 考据之学的实证研究不可避免地引导人们走向实际生活, 关注实际社会, 这也为传统的经世致用理念的发扬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这种学风的转变首先影响到了洋务派的大员们, 如曾国藩就是晚清从理学走向经世之学的代表, 但是要看到, 他内心深处还是非常留恋传统儒学的, 对于西学的接受充满了被动性, 这也是曾国藩力图把自己塑造成最后一个大儒的内心状况。 因为经世之学可以分为传统的和西学的, 后者比前者的境界要高远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 左宗棠比曾国藩接受西学要更为主动。“左宗棠则于道光十五年就‘绝意科举, 专致实学, 甚至于孔孟大道, 亦少言及。’他为学侧重于舆地、图志和兵事, ‘治实学与其同时代之龚定庵、魏源等相同’。”[4](p110) 另一方面, 洋务运动的思想家们如冯桂芬等更是接受了这种由儒家传统向新的学风的转变, 因而当时局一变的时候, 他们能够很快适应新的形势, 提出变革的要求。再加上从第一次鸦牙战争开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短短 20 年的时间里, 西学的传播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从 1843 年到 1860 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 这六个城市(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共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达 434 种, 几乎与明清之际 200 多年间译著的西书数目相等。”[4](p83) 虽然, 这些书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圈中传播, 但它的范围和影响要比第一次西学东渐时强得多。 而且, 这时又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创痛, 也无形中加速了新思想的传播。 所有这些终于导致洋务运动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但是, 洋务运动的效果如何呢?这个指标能够充分反映引进西学的成功程度。作为同期实验的比较, 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 年)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同步, 但是日本选择的革新路径与晚清不同, 日本是全方位吸收西方的科技, 而晚清的吸收是从制器开始的, 也就是说从器物层次吸纳西方的长技, 而不像日本一开始就是全面吸收, 经过 30 年的发展, 中日这种革新的成果在甲午海战较量中得到了全面的检验: 结果是以清朝的失败为这场改革运动划上了句号。由此, 清末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国人震惊之余, 再次醒悟:“‘西人之强者兵, 所以强者不在兵’。光有自然科学的引进并不济事, 更要紧的是西洋的社会科学, 是法律、制度等, 于是方疾呼: ‘今日之际, 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译之’。”[6](p57) 其实, 在回顾洋务运动失败的历史同时,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 在这场运动的背后有一条无形的主线, 即文化的转向。从清初的乾嘉学派注重考据之学, 到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的注重经世的实学的转向, 已预示了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传统中学的空谈误国, 进而要求改变这种不务实的学风, 极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 而且这本是中国儒学传统的一种学风。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 “谓学问当讲求者, 在改良社会增进其幸福, 所谓国计民生是也。但道咸之际的‘经世致用’学术文化, 却与清初‘经世实学’的侧重点完全不同, 主要表现为

四个方面: 一是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 二是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诸大政; 三是探究边疆、域外史地以筹边御外; 四是变一味考辩古史为写当前的活历史。"正是这种学术的转向, 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洋务运动的践行者。科学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初期, 洋务运动应该说是直接的导火索, 而隐藏于后的传统中学的转向则为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洋务运动的最初目的: 富国强兵。可是实际后果却是加速了晚清的灭亡, 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因为, 师夷长技并不必然保证西学中除长技以外的东西不跟随进来,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从长技到西学中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哲学等文化方面的因素也一并进入传统的中学领域,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学与西学的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如果说在 1840～ 1860 年间是中西的矛盾和对抗的话, 那么在 1860～ 1895 年间的洋务运动时期则是中学与西学的紧张与冲突时期, 在这个时期文化上的应对策略就是中体西用。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与先前的"中本西末"论相比, 更具有理论色彩, 并且着重于以西学补中学之缺失。具体实施就是把各省原有的学院变成新式学堂, 再加上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新式洋务学堂, 以及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各种学校, 用于培养会通古今的经世致用的人才, 以实现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正是这个指导原则导致对西方近代完整科学的肢解, 使中国人误以为西方的科学就是长技, 而没有认识到这种长技背后的东西。但是, 不论怎么说, 洋务运动毕竟为中国认识世界和接受西学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这种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洋务运动提出的应对策略"中体西用", 既是当时洋务运动执行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硬性限制, 又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情况下唯一可行的举措。因为任何人都得根据一定的时代背景进行思考, 超越于时代往往事与愿违, 如洋务重臣郭嵩焘提倡西学竟至于在清流舆论的排挤下, 抑郁而终。应该说郭嵩焘是洋务运动中眼界最高的人, 他已经看到洋务运动存在的巨大局限, 但是如果远见不能变成现实, 那么也是失败的, 因为于事无补。因此,"洋务运动的后期, 由进步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中体西用'、'中道西器'和'中主西辅'的论辩, 就是试图找到突破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 并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寻求理论支持的一种尝试。"[4](p278) 应该说这种努力是有成效的, 它即刻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使许多洋务的举措得到了实行。它的失败从一定意义上说又一次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 使"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逐渐变小, 以至最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间(雷颐语, 2000)。但造成这种腐朽的根源却在于自东汉以来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结果, 导致传统中学的僵化, 以及广大知识阶层被束缚于传统中学中, 而不能面向实际社会。对比而言, 日本的明治维新采用的策略"和魂洋才"可以说与"中体西用"异曲同工, 但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这又一次唤醒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去求索西人长技背后的东西, 正是这种反省, 使中国新生的科学主义又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二、中国科学主义在制度维度上的扩张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的失败, 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为标志, 朝野上下, 无论保守与革新派都深刻地意识到洋务运动失败了。看来只有长技并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还需要引进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 这才是西学之本。我们不但技不如人, 甚至连我们一直自诩的本也不如人, 这种刺激是强烈的。它促使整个朝野和知识阶层再一次去反思什么是富国强兵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 1895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葛兆光认为:"'1895 年, 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 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 '自强'成为朝野上下的普遍观念, 彻底改革也突然成了上下的'共识', 而改革的路向也一致向西转。"[7]相对而言, 科学主义也力图在变动的形势下寻找新的生长空间, 对于中国的科学主义的发展来说, 我们认为正是从这一刻起中国的科学主义开始向更高的层次扩张, 突破原来的器物层面, 进入到社会的制度层面, 这种跳跃是由于历史的突发事件引起的。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 我们认为它的存在时间为 1895～ 1915 年。

甲午战争的失败, 更坚定了先进知识分子改革的决心, 围绕着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核心问题, 构成了这 20 年发展的明线, 在这条明线背后的是中学、西学、新学的冲突与演化的暗线, 正是这条暗线为社会改革这条明线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合法性的基础。但这一点又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 因此, 从这里入手, 我们会发现科学主义从器物层次向制度规范层次跳跃的根源所在, 以及实现这些目的的特殊路径。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 无论顽固的保守派还是激进的改革派, 都在考虑下一步中国该怎么办? 这无疑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同时也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危机, 而此时朝廷重臣张之洞对时局的危机感和提出的变法对策, 代表了当时洋务派中部分头脑较为清醒的人士的见解。他认为:"凡我普天臣庶, 遭此非常变局, 忧愤同心, 正可变通陈法, 以图久大, 不泥古而薄今, 力变从前积弊, 其兴勃焉, 又何难雪此大耻。"[8](p178) 但是, 张之洞的变法主张仍在洋务运动的陈旧框架内打转, 而具体主张无非还是洋务派的那些措施, 如强调练陆海军、修铁路、设枪炮厂、开办学堂、讲求商务工政、多派游学人员等, 丝毫没有什么新意, 更何况这套措施已经被证明是不能挽救危亡时局的, 因而也就无法得到知识阶层和朝野

的支持。此时,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作为新一代的有识之士,顺应历史的潮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通过倡导新学,提倡变法维新使中国的文化和对中西观的认识都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维新派的新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晚清经过 30 多年的洋务运动,从效果上看不管成绩如何,但是它对于西学的引入中国还是功不可没的,此时人们对西学的认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船坚炮利,而是对中西两种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反思师夷长技失败的原因何在。早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一些比较开明的大员和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洋务运动在文化观上存在的缺陷,已经提出了改变洋务纲领的一些主张,如在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在同治、光绪年间的关于"筹议海防"第二次大论战中(这场论战从同治十三年即 1874 年冬天,到光绪元年即 1875 年夏初,持续半年之久,是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守与革新之间的争论,争论的范围也比前一次同文馆之议宽广),洋务大员郭嵩焘就认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8](p120) 这样一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洋务纲领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西学也有本有末,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有关中西的本末、主辅、道器、体用的简单划分,直接指涉了洋务运动更应该学习西方的本,而不仅是西方的末,即造船、制器等,可惜当年郭嵩焘的认识太超前了,以至于没有人能理解这些,因而也没引起什么反响。当甲午战争的失利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失败关键在于只学习了西方的末,而未学习西方的体。因此维新派的思想家们从起点上就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眼界上,认识到面对今日之千古变局,只有从本上下工夫,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即只有变法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而为了给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和合法性,维新派人士倡导新学,以此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那么新学到底是什么呢?首先需要界定的是,新学不是西学也不是传统的中学,按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不中不西",那么,作为维新基础的新学到底是什么呢?这要从康有为的理论说起。维新期间作为变法学理基础的是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它的基础就是被康有为发挥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兴起是由嘉道年间的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完成的。"他们起来向长期雄踞学坛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派挑战,不仅体现着经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变迁,而且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要求学风有新的转变。承袭庄、刘今文经学精神的龚魏诸人,更加不满足于注疏、考证、训诂、名物的学问,经过他们的推动,使得推崇今文经学与提倡经世致用的主张逐步合流,重开一代新风。"[8](p204) 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康有为写出了上述两本书,鉴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多了,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新学,打破了以往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划分,在经过改造后的中学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近代的科技成果和文化,使它的境界一下子超出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观许多,突破了传统的体用之分,大胆利用西方的"体"即大本大原,提倡改革与变法,可以说这些措施和办法在当时的中国,应当说是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是振聋发聩的。因为它深深地动摇了守旧派的学理基础,此时倡导的西学已经不止是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同时还包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哲学等全部内容,而且尤其强调西方的政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学之出现,以及在朝野知识阶层中引起的剧烈轰动是可以理解的。按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的说法,他的新学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当然康有为在这里有以教主的身份吹嘘的嫌疑,但是要看到,以康梁为代表的新学的确与洋务运动和之前的学问截然不同,根据丁伟志等人的总结,新学之新,不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援西学改造中学;2. 兴起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3. 复活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精神,改革治学宗旨,整顿学风流弊。"[8](p191)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康梁的新学已经发展成初步用西方科学精神分析所谓千古不变的中体问题了,这标志着中国新生的科学主义已经从器物层次向制度层次的变迁,这种变迁的明显标志是戊戌变法的发生。先进的中国人试图用西方的政体改造传统的中国政体,以达到使中国富强和摆脱危机的局面,而这些都是洋务派所不敢想象的。虽然百日维新很快就失败了,但它传播的思想却越发强烈,也使先进的中国人再一次认识到,只有彻底地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毫不妥协地改革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中国才能真正达到富国强兵、实现救亡的目的。这种文化理念在戊戌变法后的 10 余年间得到了充分论证与发展,并以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政体改革的实现,这也预示着中国的科学主义开始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这次变迁的内容将深入到文化的深层结构即价值观念层次,它的影响是深刻的,而且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制度化的巩固,也只有从这个层次上说,中国的科学主义才在最相近的意义上与西方科学主义趋同。那么这个让中国的科学主义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它又有什么特点呢?只有把这些问题从根源上梳理清楚,才能真正理解科学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它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三、新文化的兴起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化

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康、梁为代表的新学经过短暂的繁荣后，很快就从文化的舞台上被淡忘了，伴随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兴起，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中，以保皇派的论战失败而彻底宣告曾经兴旺一时的康、梁新学已经被革命派彻底抛弃。至此，中国的文化又一次发生了意义和影响都非常深远的变迁，正是这次变迁导致科学主义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渗透，并以建制化的形式出现在社会舞台上，而完成这次变迁的导火索就是以陈独秀等为代表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即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鉴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这里不再赘述。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某种意义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科技的被迫引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嬗变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新文化运动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传统中学以及康、梁的新学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学者汪澍白指出的那样："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武装起义的方式，一举推翻了清王朝，挂上了民主共和的新招牌。但它却基本上没有触动两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心理结构。"[2](p107) 鉴于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认为，近代西学东渐"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表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9](p107) 在陈独秀看来，中西两种文化接触与冲突的过程划分为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并把当前的阶段称为伦理问题的阶段，那么陈独秀的伦理问题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在争论的体的问题。按陈独秀的说法就是：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因此他认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正是这种对文化的价值规范层面的强调，是他认为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工作，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个任务一直没有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他称他发动的这场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同时由于其反儒学的纲常名教与西方启蒙时代反宗教神学性质相似，故也称之为启蒙运动。从这种意义上说，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超越70年来在体用问题上的争论与纠缠。那么实现这个目的的突破口在那里呢？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那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正是这种被封建统治者利用的儒家文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因而，"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便以逆向思维方式毅然举起'反孔'的旗号，通过反传统来推动思想启蒙。选取孔家店作为突破口，有利于一举冲破旧的以礼治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建构新的文化格局开辟道路。"[2](p109) 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也就明显起来，它的反传统特征就是为了彻底打破在体用问题上的障碍，由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一切有利于中国富强的方法和措施，而不必再去考虑体和用的区分，凡对改造中国守旧文化有利的各种方案都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由此开始了激进的文化改造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孔家店进行挑战，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性的意味：如果不把儒学从神圣的云端上扯下来，最后的改革又会落在儒家为封建统治谋取存在合法性的陷阱里。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些学者看来是一种激进的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如旅美学者林毓生博士认为："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主义者，虽然也认为他们的传统文化与政体是他们的特有民族生活的源泉，但是他们却与这个传统文化与政体产生了极大的疏离感，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体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与抨击。在'意缔牢结'（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不允许任何传统成分得到正面的评价与理解。但是，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思想上的混合，产生了极大的紧张，造成了日后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上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10](p153) 林先生对五四反传统的后果的分析，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但是就五四对未来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造成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是破旧立新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一种温和的道路根本行不通，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的惨痛教训，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矫枉过正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林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的苛刻要求，并没有能客观地依据当时的境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所以对传统文化采用激进的方法，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扫清最大的障碍，而不是绕过它。也许这正是五四先辈们的最大贡献（他们大多数人的古文化的功底是相当深厚的，采取这种激进的路线，他们的内心也是经历过不为外人所知的巨大的痛苦转型的，而非是从一张白纸式心灵开始的），也是吸取70余年的惨痛教训的结果。科学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大障碍被扫清以后，科学主义向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扩散才成为可能。然而即使是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向文化的深层结构推进科学主义的观念，仍然面对着巨大的阻力，可见传统文化的惯性有多大，更不要说没有经过五四的思想洗礼的状况了，这主要在五四以后的科玄论战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在这场中国近代思想史意义重大的论战中，科

学派的胜利应该说是时代的必然,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扫清思想障碍的作用(在科玄论战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玄学派进行了批评,并对以胡适为代表的多元历史观进行了批判,这也是后来有的学者考证说:中国存在第三种形式的科学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11](p15)的原因所在),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即价值观念层次。正如胡适在序言中写到的那样:近 30 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尚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此时中国的科学主义才真正具有了科学主义在西方最初具有的含义,即:"科学主义是一种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唯一有价值的部分。"[12](p1)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与推动,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迅速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科学主义迅速地走向制度化的较高级形式。它的主要标志是科学共同体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社团的出现,以及国家以制度安排形式出现的科研机构等。

至此,经历了近 90 年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与努力,以及挫折和失败,科学和科学主义终于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得到巩固,从此中国的科学和科学主义开始与国际上的各种有关科学的思潮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的科学和科学主义也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后中国的科学和科学主义开始进入成熟发展的时期。

四、余　论

综上所述,在科学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文化冲突,而其中成熟文化的保守性也是导致文化融合的最大障碍。从这个角度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以激进主义的路径向传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只有这种大破才能大立。一种以科学和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才能在传统文化的围剿中得以生存,进而导致科学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制度化的保证,为科学主义的生存赢得了合法性。至于林毓生博士对五四激进传统的批判,我们认为有合理的部分,但是考虑到五四时期所处的文化环境,我们认为不采取这种激进的措施就不能完成改造传统文化的目的,进而科学主义在中国也无法取得应有的生存空间。但是林博士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倒不失为一种在平静时期改造文化的手段,不过在当时是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的,尽管五四的先辈们的各种观点包含了诸多的谬误与疏漏,但是对于冲破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说,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还要提及的一点是,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科学主义诞生在明末清初,理由是当时的朴学的治学方法与后来的实证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重视考据与义理的问题。而科学主义在最普通的意义上是强调科学方法的万能的,进而认为科学是最有价值的,这与明末清初的治学方法具有某种惊人的、偶然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这就是中国科学主义的雏形,因为科学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应该是与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因而把这个时期定为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诞生显然欠妥当。故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科学主义从最低级的形态算起应该是在 19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与当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兴起处于同一个时期,但他们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详细的介绍),而非有些人认为的是在明末清初,只有这样考虑中国的科学主义才是符合本意的。至于国内学界流传甚广的美国学者郭颖颐(D. W. Y. Kwok)的观点:认为中国科学主义诞生在 20 世纪初,我们认为他缩小了中国科学主义的问题域,这个时期的科学主义应该是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主义的第二个时期,这主要是由于他没有看到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有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不过他对 20 世纪以后的 50 年的中国科学主义的分析,还是比较有新意的。正如他所说:"1900 年后三十年隐含了后来中国发展的大量线索。"[13](p7)

至此,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梳理,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的科学主义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警惕科学主义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也会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地位的话语霸权。由于实行科学主义的后果就是加速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和大工业时代的来临,而建基于人类理性基础上的科学主义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工具性对人的控制,而工具理性是人类理性理想的减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理性,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正是敏锐地意识到了人在这种缺失的理性控制下,所面对的尴尬境遇:单向度的人,所作的一种思考;而且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在很早以前就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批判,如 30 年代以《学衡》杂志为阵地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梅光迪、梁启超(晚年)、梁漱溟、辜鸿铭、林纾等,极力排斥西方文化,"所有这些人物都批评现代化过程及其结局是对人类诸般价值的残害,他们提倡融合的中西文化,指出未来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码将来的中国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14](p5)虽然他们的大多保守观点不 足取,但是他们的有些见解还是很深刻的。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一种否定性

的思维,既不能像上面所说的保守主义那样,也不能像陈序经那样提出一种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刻以一种清醒的、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多元文化的共存,才能避免出现极端的做法。否则的话,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科学主义都是盲目的;而且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今天,正确认识科学主义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与应用科学都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颐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所的杨国荣教授慷慨的赠、寄他们有关的著作,他们的学术成果丰富了本文的许多思想,特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1] 滨下武志. 朱荫贵,欧阳菲译.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汪澍白.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 雷颐. 取静集[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4] 王先明.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 李述一,李小兵. 文化的冲突与抉择[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 葛兆光. 1895 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J]. 开放时代,2001(1).

[8] 丁伟志,陈崧. 中西体用之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 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J]. 汪澍白.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10] 林毓生.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1] Shiping Hua.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M]. Published b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5.

[12] 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M]. 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 1991.

[13] (美)郭颖颐(雷颐译).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物科学主义(1900～1950)[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14] (美)艾恺.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A SURVEY OF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SCIENTISM IN MODERN CHINA

LI Xia, XING Run-chuan, Zhao Dong

(Scientific Philosophy Research Center,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Science and scientism in China underwent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generation period, organization period, and maturation period. Correspondingly, the cultural formation of scientism was presented in implements, systems, and values. Before the accomplishment of its transition, it implied the ideological preparations for the traditional transformation, without which the legal existence of scientism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division of time for th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s: generation, 60～70s of the 19th century; organization, 90s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maturation, 20s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scientism; generation, evolution; path

[责任编辑 李启贤]